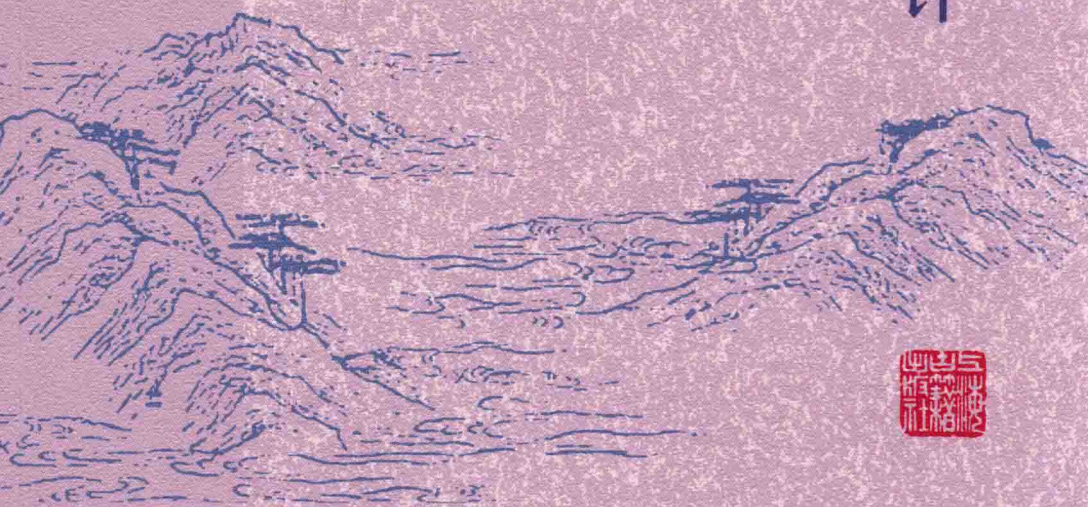


袁宏道散文注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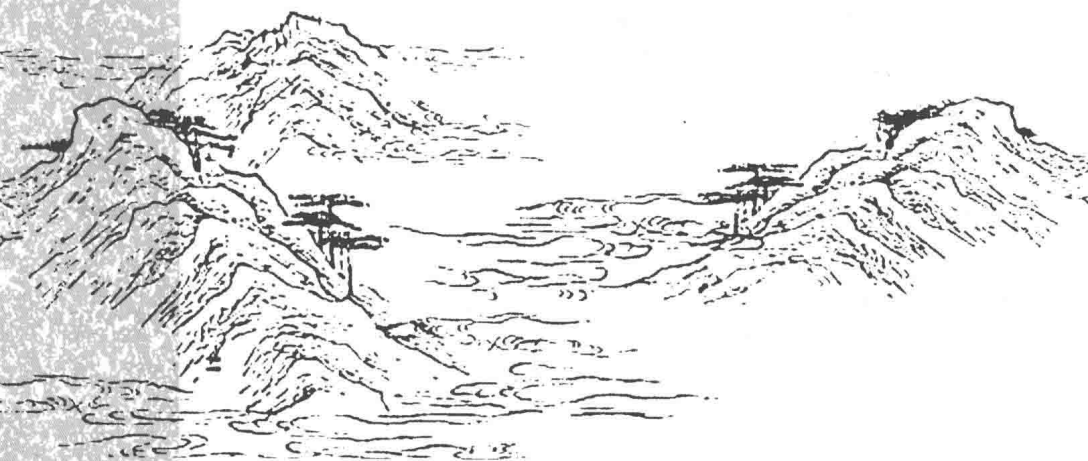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明」袁宏道 著
孙虹 谭学纯 注评



袁宏道散文
注评

〔明〕袁宏道 著
孙虹 谭学纯 注评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宏道散文注评 / (明)袁宏道著. 孙虹, 谭学纯
选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6. 11

ISBN 978-7-5325-8272-3

I. ①袁… II. ①孙… ②谭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注
释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6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3350 号

袁宏道散文注评

[明]袁宏道 著

孙虹 谭学纯 选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4.7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8272-3

I · 3115 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 言

袁宏道(1568—1610),字中道,一字六休,号石公,公安(今湖北省公安县)人。与兄宗道(字伯修)、弟中道(字小修)并有才名,世称“公安三袁”。袁宏道一生的行谊,在其弟袁中道《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》(以下简称《行状》)中有详细的记载。袁宏道万历二十年(1592)考中进士,万历二十二年(1594)授吴县(在今江苏省苏州市)县令。在吴县任上,袁宏道是一位德能兼备、勤勉而有业绩的官员,深得吴县人民的敬爱。但由于天性疏脱,加上疟疾的长期折磨,庶祖母詹大姑年迈多病,以及对天池一案的处理意见与上司不合,他连上七封奏疏要求解官或改任,终于在万历二十五年(1597)正月被批准解官在家养病。父亲袁士瑜对袁宏道年仅二十八岁就退出仕途深感不满,袁宏道不得已把家眷暂时安置在无锡(今江苏省无锡市)。为遵父命,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入都(今北京市),授为京兆太学博士,稍迁礼部仪曹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七月,奉使河南周藩瑞金王府掌行丧礼,顺道南返家乡。这年九月,袁宗道在北京逝世。这使笃重友于之情的袁宏道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,他再次上《告病疏》,要求病归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获请后,在家乡营柳浪居,隐居了七年之久。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仍然是为了不拂老父之意,起补京兆学官,再次入京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奉命至蒲圻(今湖北省嘉鱼县境内)存问原右都御史谢鹏举,万历三十六年(1608)正月假归公安,不久回京。抵京后,补验封主事,摄选曹事。万历三十七年(1609)任陕西主试,事竣之后,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假归公安,

当年九月初六卒于家中。英年早逝,仅得年四十三岁。袁宏道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,基本上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。袁宏道不论官隐与否,一生好作名山之游,足迹遍及今湖北、湖南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陕西、河南、北京、天津等地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。

在严格意义上,我国文人除极少数的异类人群之外,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。但由于宋代儒学已是兼融道释思想的新儒学,加上南宋初发轫、明代臻于极盛的心学影响,儒学对于道释思想进一步兼容并蓄,儒学的体系也因之更趋体大思深。袁宏道的思想是由时代风云际会所铸就,这表现在袁宏道是从儒家正脉程朱理学的性理(或称性命)之学悟入,但明显践行援道释之虚入吾儒之实。关于这一点,《行状》中亦有记载:“明年(按,即万历十九年),上春官。时伯修方为太史,初与闻性命之学,以启先生。先生深信之。下第归,伯修亦以使事返里,相与朝夕商榷。索之华、梵诸典,转觉茫然。后乃于文字语言意识不行处,极力参究,时有所解,终不欲自安歧路,恃燭火微明,以为究竟。如此者屡年,亡食亡寝,如醉如痴。一日见张子韶论格物处,忽然大豁,以证之伯修。伯修喜曰:‘弟见出盖缠,非吾所及也。’然后以质之古人微言,无不妙合,且洞见前辈机用。白雪田中,能分鹭鸟;红罗扇外,瞥见仙人。”张子韶,即张九成,是程门嫡传杨时的弟子。“张子韶论格物处”,是指张九成在江州(今江西省九江市)时,与大慧禅师论“格物”,大慧拈出“物格”之说,张九成因之顿悟儒释一贯之理。由此可知,袁宏道思想与明清时的正统文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但在对本体论的看法上,摒弃了程朱理学的天理,倾向道释二家的心性,他的《金屑》、《广庄》、《西方合论》、《德山麈谈》等文章都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。如众所知,袁宏道还受到乃师李贽的影响。李贽狂狷叛逆的行为方式,以及著名的“童心说”——“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”——崇尚赤子婴儿之心的思想,袁宏道经过沉淀之后,化为了自身思想的精髓。其思想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面。

首先,关心世道,立身有则。鲁迅先生指出了袁宏道思想的这一特点:“中郎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么?有的。万历三十七年,顾宪成辞官,时中郎主陕西乡试,发策,有‘过劣巢由’之语。监临者问‘意云何?’袁曰:‘今吴中大贤亦不出,将令世道何所倚赖,故发此感尔。’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,佩服‘方巾气’人物的人,赞《金瓶梅》,作小品文,并不是他的全部。”阿英《袁中郎全集序》也着重谈论了袁宏道关心世道的问题。袁宏道关心世道,表现在如下几点。一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,《清代抽毁书目》斥责他的《宋帝六陵》诗“有偏谬语”,其实与此同一体裁的散文《六陵》亦同一情怀。其中“读唐义士诗,楚痛入骨”,“唯有老松横道,杜鹃花滴血满山而已。相与悲歌感慨,泣数行下”数句,抒发的就是民族悲怀。另如《答蹇督抚》、《飞来峰》诸文,均属此类。二是无论进退,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。袁宏道早在中式前后,就表现出“屈指悲时事”(《登高有怀》)的倾向。他的《古荆篇》、《拟作内词》(八首)都是讥刺朝廷甚至神宗的诗作(见钱伯城《袁宏道集笺校》)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一生虽然与仕途若即若离,但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对国家大事的关注度。比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他在写给山中居士黄辉的书札中说:“但每日一见邸报,必令人愤发裂眦,时事如此,将何底止?因念山中殊乐,不见此光景也。然世有陶唐,方有巢、许,万一世界扰扰,山中人岂得高枕?此亦静退者之忧也。”(《与黄平倩》)钱伯城先生对其中的“时事”有笺释:“其时宦官横行,朝臣聚党互攻,外患潜伏,国事方隐忧未已。”《祭周隆之侍御文》中,他还借人才与气运的关系大胆申说国家命运堪忧:“尝闻天下有道,则人才易生,亦易成就,而国家享黄发之赐。气运将塞,则人才先受其祸。……吾辈所以哭者,若但以堂上之孤独,血胤之鲜少,同乡同举之情,则其哀亦仅仅而已,不至若永叔之所云也。”所有这些忧世之感都可以与他那首著名的《显灵宫集诸公,以城市山林为韵》(其二)互为印证:“野花遮眼酒沾涕,塞耳愁听新朝事。邸报束作一筐灰,朝衣典与栽花市。新诗日日千余言,诗中无

一忧民字。旁人道我真贲贲，口不能答指山翠。自从老杜得诗名，忧君爱国成儿戏。言既无庸默不可，阮家那得不沉醉。眼底浓浓一杯春，恸于洛阳少年泪。”三是立身行事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袁宏道的初授官为吴县县令，在政务繁剧的吴地，袁宏道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，当地百姓视其为“仁明父母”，宰相申行时曾誉其为“二百年来，无此令矣”。但是，因为天池山之讼，“先生意见与当路相左，郁郁不乐，遂闭门有拂衣之志”（以上俱见《行状》）。“天池山之讼”的内幕今人已经无从知晓，但可以推定的是此案肯定与达官贵人有某种牵连（据袁宏道书札《袁无涯》，此案至万历三十四年尚未了结，可见牵涉之深广），上峰意不欲深究。如果不拂己志对此事进行处理，于宦途升迁将会是致命的障碍。袁宏道志同道合的好友汤显祖任遂昌（今浙江省遂昌县）知县时，曾传讯项应祥第四子项天倪，项应祥是当时权臣给事中王锡爵门生。为此，汤显祖上计（考核）甚至辞归后曾屡受折辱。袁宏道为不使自己处于被动尴尬中，毅然选择了远离官场风波。即便如此，他的内心也有过矛盾和挣扎，甚至没有真正冷却过事功的念头：“弟近日颇学下下根行，一切烦碎等事，力可能者，断断行之。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，不得草草过日耳。”（《答陈正甫》）“陶石簞近字，道其宦情灰冷。弟曰：吾儒说立达，禅宗说度一切，皆赖些子暖气流行宇宙间，若直恁冷将去，恐释氏亦无此公案。苏玉局、白香山，非彼法中人乎？今读二公集，其一副忧世心肠，何等紧切。以冷为学，非所闻也。”（《与刘云峤祭酒》）但在“吏情物态，日巧一日，文网机弈，日深一日；波光电影，日幻一日”（《何湘潭》）的社会背景下，他更强调立身有则：“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，弟以此益闲。尘车粪马，弟既不爱追逐，则随一行雅客，蒔花种竹，赋诗听曲，评古董真贋，论山水佳恶，亦自快活度日。”（《与黄平倩》）袁宏道一生从未停止过游历，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的泛泛而游，而是有意识地作为为了超脱尘世、与自然相亲、提升道德的途径，他在《答小修》信中所说的“登山临水，终是我辈行径，红尘真不堪也”一语，可以作为他一

生游历的注脚。袁宏道或远离官场风波,或超脱于官场的庸俗之外,是独善其身式的济世,这种方式有不可讳言的消极性,但与激扬官场俗波相比,也不失为一种有补于世的选择。

其次,性情至上,行藏在我。我国哲学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理学和心学两大体系,但无论理学心学,性与情都是分属人类意识两个层面的一对范畴。性,主要指人类的禀赋气质;情,则是指性的感物而动,也即性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喜怒、好恶、哀乐等心理反应。理学与心学的深刻分歧在于对“性”之内涵的界定。理学重天理之性,认为天理是大自然至善永恒的法则,也是儒家取法天地建立的仁、义、礼、智等社会道德规范,这是人性最本真的存在。心学则重气质之性(或称自然之性),认为圣人遂民之欲,体民之情,所以七情六欲,都是性中的合理存在。袁宏道是典型的性情中人,他笃于天伦,入孝出悌。为庶祖母詹大姑,陈情之深,有过于李密;为父亲袁士瑜,他两次弃隐就官;对待兄弟,更是友于过于常人,与小修如同形影;对待朋友,他最重以情交往,虽穷愁潦倒、放浪形骸如方子公者,也不弃不离,始终爱人以德。对已故的亲人、朋友也是一往而深,如病重时梦见丘长孺,“(长孺)相视而哭曰:‘余无所依矣。’醒时,泪犹涔涔也”(袁中道《游居柿录》)。伯修下世后,思念未尝一刻去怀,无不是精诚所至之真情。就性而言,袁宏道主张随顺自然,率性而行。这在给冯其盛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表述:“夫鸚鵡不爱金籠而愛隴山者,桎其體也;雕鳩之鳥,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,違其性也。異類猶知自適,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,豢養于祿食邪?”(《冯秀才其盛》)在《识张幼于箴铭后》一文中,袁宏道分世人为放达和慎密两种性格类型,他认为两种人无所谓优劣:“袁子曰:‘两者不相肖也,亦不相笑也,各任其性耳。性之所安,殆不可强,率性而行,是谓真人。’今若强放达者而为慎密,强慎密者而为放达,续凫足,断鹤胫,不亦大可叹哉!”但袁宏道更欣赏疏狂的奇士,他对新、险、奇、变山水的不倦追求,辐射出了独特的人格祈向:不屈从传统、离经叛道的倔犟姿态,以及“我

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”的张扬个性。

袁宏道的隐居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天性对自然山水的热爱：“余性疏脱，不耐羁锁。”（《游惠山记》）但他并不讳言自己有丑贫求富之心：“弟此时实当出，所以迟回者，实迂懒之故，非真不爱富贵也。孔子曰：‘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。’”（《答吴本如仪部》）袁宏道之所以选择归隐的深层次原因，在与好友汤显祖讨论陶潜出处问题时有夫子自道：“每看陶潜，非不欲官者，非不丑贫者；但欲官之心，不胜其好适之心，丑贫之心，不胜其厌劳之心，故竟‘归去来兮’，宁乞食而不悔耳。”（《汤义仍》）在他看来，为官之苦，有不堪忍受的异化人性之处：“大约遇上官则奴，候过客则妓，治钱谷则仓老人，谕百姓则保山婆。”（《丘长孺》）需要“一副贱皮骨”、“一副笑嘴脸”、“一副强精神”、“一副狠心肠”（《沈广乘》）各各应付。并且官场风波也是扭曲人性的一柄双刃剑：“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，无形影的风波，青岑可浪，碧海可尘，往往令人趋避不及，遁逃无地。”（《沈广乘》）所以，袁宏道的隐居，更像陶潜一样，是在违性和适性之间，所作出的不愿意用物质富有与精神自由进行互换的选择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袁宏道鄙视为追求富贵而逆情反性之人，他在《游苏门山百泉记》中说：“或曰：‘投之水不怒，出而更笑，毋乃非情？’曰：‘有大溺者，必有大忍，今之溺富贵者，汨没尘沙，受人间摧折，有甚于水者也。抑之而更拜，唾之而更谄，其逆情反性，有甚于笑者也。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。’”由于上述种种原因，袁宏道实践了苏轼心向往之，但没有实现的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闲处看”（《沁园春》）之洒脱。袁宏道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进士及第；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授吴县令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解官；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升为国子监助教，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谢病归；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到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逝世前，任京兆学官、仪曹主事等职。出仕虽然十九年，但居官仅九年，大半时间隐居不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袁宏道并非成为谪客逐臣后才被动隐居，而是为实现精神愉悦

的主动归隐(其挚友江进之、陶望龄也步其后尘)。袁宏道弃官总是托辞自己或家人疾病,但实际并非如此。以他第一次弃官为例:解官前,自己和庶祖母的病体都已经痊愈,这从他解官后没有立即回到家乡,而是踏上长达三个月的浙江、安徽的游历之途可以得到证明。袁宏道的隐居更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需要,他给友人黄绮石的信中形容解官之后的心情是:“乍脱尘网,如巨鱼纵大壑,扬鳞鼓鬣。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,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,波波吒吒,觅什么举人进士也。”(《黄绮石》)在给伯修的信中,他又描述了弃官后在山水陶冶以及对义理的探讨中,形神相亲的无上愉悦:“自堕地来,不曾有此乐。前后与石簞(陶望龄)聚首三月余,无一日不游,无一游不乐,无一刻不谈,无一谈不畅。不知眼耳鼻舌身意,何福一旦至此,但恐折尽后来官禄耳。潘景升忒煞有趣,是丘大、袁三一辈人,已约同至杭,道苏之白下矣。西湖看花是过去乐,岩镇聚首是见在乐,与景升南游是未来乐。”(《伯修》)后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出为国子监助教,不过两年,再次谢病归。但是不久,他又踏上了江西庐山、湖北玉泉山、太和山的游历之程。并在家乡经营柳浪居,作长期归隐之计。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父亲要求袁宏道以再次出仕了结世局,他虽然不违严命,但归隐林泉之念未尝一日息于胸中,竟至于在生命的弥留之际,也不能置怀。袁中道《从沙市至度门记》一文,记录了他的梦期心约:“万历庚戌秋,兄中郎方家居,相约为玉泉游,且欲结庐买田,老于其间,病中犹喃喃不置。”袁宏道卒后,葬于公安县的刀环里,距离少小读书之地杜庄长安村仅五十里之遥。“烟光逐日改,那得不归休”(《偶题》)。灵魂来止于故乡,得其所矣。

袁宏道的友人雷思霈为序《潇碧堂集》时说:“石公胸中无尘土气,慷慨大略,以玩世涉世,以出世经世,姱节高标,超然物外,而泾渭分明,当机沉定,有香山、眉山之风。”可作为袁宏道一生的定评。

二

袁宏道不仅是“公安派”的领军人物，也是“公安三袁”的翘楚。前人对袁宏道文学理论中的独抒性灵、不拘格套、流出胸臆（《小修诗序》）等观点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，但对于这些观点显示出的理论意义的探讨显得相对薄弱，因此，本节将以此作为关注的重点。我们分三个层次展开讨论，即：蔑视法度，师心自用；穷新极变，别是一家；水机文心，一种异形。

其一，蔑视法度，师心自用。所谓法度，是指明代在举世复古的浪潮中形成的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——内容与形式对政治盛世的字模句拟、步趋相随的格套。就作品内容而言，明代虽然也是华夏民族的一统天下，但局势与气运与汉唐相比不啻霄壤，特别是当明代初期永乐盛世昙花一现后，明代中期前后七子对大一统声威的歌颂，就成为与现实不符的“大声壮语”（《叙姜陆二公同适稿》）。就作品形式而言，尽管它有一定的独立性，但从本质上说，是被作品内容所决定，是作品内容对形式的主动选择。明代复古者空洞的“大声壮语”选择了本属于汉唐的法式、音度、规矩、物则，并以此倡导天下。正如李梦阳《答周子书》所说：

仆少壮时，振翻云路，尝周旋鸛鹭之末，谓学不的古，苦心无益。又谓文必有法式，然后中谐音度，如方圆之于规矩，古人用之，非自作之，实天生之也。今人法式古人，非法式古人也，实物质之自则也。当是时，笃行之士，翕然臻向，弘治之间，古学遂兴。

天下翕然臻向复古之风，造成了明代文风的衰敝，袁宏道在《叙小修诗》、《叙姜陆二公同适稿》等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弊端：

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，文则必欲准于秦、汉，诗则必欲准于盛唐，剽袭摹拟，影响步趋，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，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。

而剽窃成风，万口一响，诗道寝弱。至于今市贾佣儿，争为讴吟，递相临摹，见人有一语出格，或句法事实非所曾见者，则极诋之为野路诗。其实一字不观，双眼如漆，眼前几则烂熟故实，雷同翻复，殊可厌秽。

此时所谓法度者，已经是“一个八寸三分帽子，人人戴得”（《张幼于》），作品形式实则成为表达的障碍。在举世为格套所拘的形势下，袁宏道与其同道力挽颓波，始创蔑法之举（袁中道《袁中郎先生全集序》）。其作诗甘为唐代的大罪人，自觉为“不似唐，是干唐律”之作（《张幼于》）。其为文为冲破格套，甚至弃苏合之香，取蛄蛻之转：“如蛄蛻之自爱其转，人固以为臭秽，勿之恤也。”（《答李元善即子髯》）对朋友江进之近乎近俚近俳之作，也持这种看法：“此进之矫枉之作，以为不如是，不足矫浮泛之弊，而阔时人之目也。”（《雪涛阁集》序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，袁宏道在摆脱格套的同时，对大法与师心、定法与自用之间却有清醒的辩证认识。袁宏道诗文定法则无，大法则有，所以小修《袁中郎先生全集序》比乃兄诗文如黄庭坚的书法——虽本无法但发而中节，这是无法而有法的最高境界。之所以能臻此境界，正是因为袁宏道能够师心自用，而非师古依人；以意役法，而非以法役意：“文章新奇，无定格式，只要发人所不能发，句法字法调法，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，此真新奇也。”（《答李元善》）也由于相同的原因，袁宏道能够弃法之迹，而得其所以为法之心，甚至以反取胜：“善画者，师物不师人；善学者，师心不师道；善为诗者，师森罗万象，不师先辈。法李唐者，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。法其不为汉，不为魏，不为六朝之心而已，是真法者也。是故减灶背水之法，迹而败，未若反而胜也，夫反所以迹也。今之作者，见人一语肖物，目为新诗，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，句规而字矩之，谬谓复古，是迹其法，不迹其胜者也，败之道也。”（《叙〈竹林集〉》）

其二，穷新极变，别是一家。袁宏道认为，文体的新变，说到

底,是作家才性的趋时而新:“不时则不隹,不穷新而极变,则不时。是故虽三令五督,而文之趋不可止也,时为之也。才江之僻也,长吉之幽也,《锦瑟》之荡也,《丁卯》之丽也,非独其才然也。”(《时文叙》)作家只能通变逐时,别无他途。《〈雪涛阁集〉序》、《丘长孺》有相关论述:

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,时使之也。妍媸之质,不逐目而逐时。是故草木之无情也,而鞞红鹤翎,不能不改观于左紫溪绯。唯识时之士,为能提其隤而通其所必变。夫古有古之时,今有今之时,袭古人语言之迹,而冒以为古,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。(《〈雪涛阁集〉序》)

夫诗之气,一代减一代,故古也厚今也薄。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,一代盛一代,故古有不尽之情,今无不写之景。然则古何必高,今何必卑哉?(《丘长孺》)

如若不然,就会沦为前人诗文之俳优和奴隶,与复古者的追求南辕北辙:

优于汉谓之文,不文矣;奴于唐谓之诗,不诗矣;取宋、元诸公之余沫而润色之,谓之词曲诸家,不词曲诸家矣。大约愈古愈近,愈似愈贗,天地间真文渐灭殆尽。(《与友人论时文书》)

唐人之诗,无论工不工,第取而读之,其色鲜妍,如旦晚脱笔砚者。今人之诗即工乎,然句句字字拾人钉短,才离笔砚,已似旧诗矣。夫唐人千岁而新,今人脱手而旧,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!……流自性灵者,不期新而新;出自模拟者,力求脱旧而转得旧。由斯以观,诗期于自性灵出尔,又何必唐,何必初与盛之为沾沾哉!(江盈科《〈敝篋集〉序》引袁宏道语)

模拟之作的大弊,就是如小儿倚物能行,独趋则仆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他欣赏小修诗文的疵处而非所谓佳处:“(诗文)大都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,非从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笔。有时情与境会,

顷刻千言,如水东注,令人夺魄。其间有佳处,亦有疵处,佳处自不必言,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。然予则极喜其疵处;而所谓佳者,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,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。”(《叙小修诗》)基于相同的原因,他不遗余力称赞被正统文人视为“魔趣别调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的徐渭诗文:“故其为诗,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,虽其体格时有卑者,然匠心独出,有王者气,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”(《徐文长传》)“其诗尽翻窠臼,自出手眼。有长吉之奇,而畅其语;夺工部之骨,而脱其肤;挟子瞻之辨,而逸其气;无论七子,即何、李当在下风。”(《冯侍郎座主》)“文有卓识,气沉而法严,不以模拟损才,不以议论伤格,韩、曾之流亚也。”(《徐文长传》)袁宏道自为文,更是独抒性灵,磨濯精光:“如名卉为寒氛所勒,索然枯槁,而杲日一照,竞皆鲜敷;如流泉壅闭,日归腐败,而一加疏瀹,波澜掀舞,淋漓秀润。”(袁中道《袁中郎先生全集序》)

其三,水机文心,一种异形。袁宏道论文主张崇尚自然,他的《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》、《文漪堂记》都是以水喻文。以水喻文而以自然畅达为旨归,最早见于苏门。苏洵论文崇尚“风生水上,涣然成章”;苏轼的《自评文》及《答谢民师推官书》发展了自然文学观,强调为文应如流水:“初无定质”、“随物赋形”、“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”、“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。袁宏道《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》、《文漪堂记》引申了水与文的比喻,对苏轼这一观点进行了扶幽发微:

夫文以蓄入,以气出者也。今夫泉,渊然黛、泓然静者,其蓄也。及其触石而行,则虹飞龙矫,曳而为练,汇而为轮,络而为绅,激而为霆。故夫水之变,至于幻怪翕忽,无所不有者,气为之也。……凡水之一貌一情,吾直以文遇之,故悲笑歌鸣,卒然与水俱发,而不能自止。(《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》)

夫余水国人也。少焉习于水,犹水之也。已而涉洞庭,渡淮海,绝震泽,放舟严滩,探奇五泄,极江海之奇观,尽大小之

变态,而后见天下之水,无非文者。既官京师,闭门构思,胸中浩浩,若有所触。前日所见澎湃之势、渊洄沦涟之象,忽然现前。然后取迂、固、甫、白、愈、修、洵、轼诸公之编而读之,而水之变怪,无不毕陈于前者。或束而为峡,或回而为澜,或鸣而为泉,或放而为海,或狂而为瀑,或汇而为泽。蜿蜒曲折,无之非水,故余所见之文,皆水也。今夫山高低秀冶,非不文也,而高者不能为卑,顽者不能为媚,是为死物。水则不然。故文心与水机,一种而异形者也。夫余之堂中,所见无非水者。(《文漪堂记》)

通过上引两段文字,我们可以得到袁宏道关于自然文学观的几点看法:一是认为作者必须有学养和道德的积蓄,而情感的抒发又必须是内心的感物而动,如此,悲歌鸣笑,有不得不然者。二是为文之形态各异,有所谓为练,为轮,为绅,为霆,为峡,为澜,为泉,为海,为瀑,为泽,则为文也应多姿多彩,应在我情我性的高蹈飞扬中展示横生逸出的美质。三是文心既如水机,则为文也应如流水不腐,光景日新。

三

袁宏道的创作实践了他的文学理论,使之成为既能集传统之大成,又能卓然自立的一代文人。袁中道《袁中郎先生全集序》论《破砚集》数语,可以移用作为袁宏道所有散文的评价,同时这也为袁宏道散文在文学史上做出了最为准确的定位:“况学以年变,笔随岁老,故自《破砚》以后,无一字无来历,无一语不生动,无一篇不警策。健若没石之羽,秀若出水之花。其中有摩诘,有杜陵,有昌黎,有长吉,有元、白,而又自有中郎。”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分为两层论列:一是包罗众体,奄有其长;二是文体丕变,法自我渐。

先看包罗众体,奄有其长。袁宏道的散文,包括游记、杂著、尺

牍都可以类归明清盛极一时的小品文。小品文常以短小的篇幅、浅显的语言,记述事实,描写景物,但白描之中总是寄寓着一定的情怀和思想。袁宏道可以说是这种文体的创始人之一,他的散文开创了小品文的范型,引领了晚明小品文的风潮。我国文体的形成,既有相对稳定性,也有一定的游移性。袁宏道曾论及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虚实特征的游移:“古之为诗者,有泛寄之情,无直书之事;而其为文也,有直书之事,无泛寄之情,故诗虚而文实。晋、唐以后,为诗者有赠别,有叙事;为文者有辩说,有论叙,架空而言,不必有其事与其人。是诗之体已不虚,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。”(《雪涛阁集》序)所以,当他创为小品文的体式时,铸就了一种融入诗歌、辞赋、散文的异质,活脱鲜雋、充满生机、和合众美的文章体裁。

袁宏道的小品文有诗歌的意境美,如《西湖一》、《云峰寺至天池寺记》:

山色如娥,花光如颊,温风如酒,波纹如绫,才一抬头,已不觉目酣神醉。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,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。(《西湖》)

少焉,云缕缕出石下,缭绕而过,若茶烟之在枝,已乃为人物鸟兽状,忽然匝地,大地皆澎湃。抚松坐石,上碧落而下白云,是亦幽奇变幻之极也。(《云峰寺至天池寺记》)

由于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创造了比兴和“连类譬喻”的象征传统,我国文学家特别是诗人往往都在物我交融中寄托自己的心志,文学作品中歌咏松竹梅者连篇累牍,均借以作为精神高洁的象征。明清以来,随着陆王心学的深入发展,作家开始步武柳宗元,把大异众趣的鲜明个性,寄托于一丘一壑的奇异风光中。袁宏道更作了让诗意栖居于小品文的尝试,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如上文写西湖之景,就写出了对杭州温山软水的主观感受。西湖使人目眩,使人神迷,使人酥融,使人惊愕的美丽,以及观者被其震慑时略带凄婉的感动也可触可及。而写无心出岫、风韵独标的庐山之云,也

是我情我性的渲染和写照。袁宏道的散文特别是山水游记中,所具有的对山水新、险、奇、变的不倦追求,其中蕴含的人格祈向,就是诗意之写境造境的源头活水。

袁宏道的小品文还有辞赋的气势美,如《游骊山记》、《灵岩》:

骊之山郁然而青,而其水浩浩然鸣九衢也。古柏森森然翳东西岭,故宫遗址,多不可识。山下之民,有雪领而杖者,作而前曰:“民虽耄,犹仿佛忆之。”指其岿然而坟者曰:“是举火台,褒女之所笑也。”指其温然而澄澈者曰:“是莲花汤,明皇、妃子之所浴也。”问山下之故垒,曰:“是尝锢三泉而闻七曜者,始皇帝之地市也。”余倚松四顾,苍茫久之。乃披荒榛,踞危石,楚声而歌曰:“涓涓者流,与山俱逝兮。空潭自照,影不至兮。吁嗟乎兹山,崇三世兮。”(《游骊山记》)

嗟乎,山河绵邈,粉黛若新。椒华沉彩,竟虚待月之帘;夸骨埋香,谁作双鸾之雾!既已化为灰尘、白杨、青草矣。百世之后,幽人逸士犹伤心寂寞之香跌,断肠虚无之画屐,矧夫看花长洲之苑,拥翠白玉之床者,其情景当何如哉?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,仲父云无害霸;蜀宫无倾国之美入,刘禅竟为俘虏。亡国之罪,岂独在色?向使库有湛卢之藏,潮无鸱夷之恨,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!(《灵岩》)

从文体论上说,秦汉的辞赋经过世代寝变,由汉代的句式虽然整齐,但裁对参差错综,往往若对若不对的韵文,一变而为讲求平仄属对的六朝骈文(文中潜气内转处间用散句,但骈句占绝对优势),再变而为形式极为规整的唐代律赋,最终在更高层次上回流而为参差错综、骈散兼行的宋代文赋。袁宏道的散文往往忽略文赋的形式,如主客问答、伸主抑客等等,而汲取了文赋的精髓:参差错综、骈散兼行,一气流转,以古文气格行之于四六之中。平易处若万花为春、弹丸走坂;沉咽处则如嫠妇夜泣、蛟龙潜跃。文章既有骈文的典重绚丽,又有散文飘逸遒劲。所抒发的都是出自胸臆之见,如上引二文,一写名位无以使山川尊荣,一写红颜并非祸水,